

上博 詩論 「眚」、「心」、「命」等範疇探析*

常森

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

上海博物館藏竹書《詩論》記錄了孔子論詩和《詩經》的材料。它雖然出於孔子後學之手，但主要是孔子本人的學術建構，對研究孔子來說，其重要性約略跟《論語》相類。以往學界關注《詩論》，焦點在《詩經》學及一般詩學方面，本文則將它納入更加寬廣的學術視野——儒家心性學說的歷史生成中來觀照。通過對《詩論》「眚(性)」、「心」、「命」等範疇進行細緻論析，揭明在儒家範圍內，眾所周知的「詩言情」、「詩言志」等觀念原本擁有更深刻的思想基礎，可概之為詩言眚(性)，而且《詩論》的意義遠遠超出了《詩經》學或者一般詩學。除了在一般詩學或《詩經》學上備受關注的範疇「志」、「情」、「音(意)」等等，它還擁有一系列十分重要的範疇，譬如「心」、「眚」以及「天」、「命」。這幾個不太受重視的範疇，在孕育七十子及其後學的心性學說體系上，實發揮了更為關鍵的作用。不過，關於孔子的文獻仍有缺失，我們現所知的仍遠未達到孔子思想的「邊界」。

關鍵詞：上博竹書 《詩論》 眚(性) 情 心 命 儒學

* 本文為如下項目之階段性成果：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：「中華簡帛文學文獻集成及綜合研究」(15ZDB065)；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後期資助項目：「出土文獻《五行》、《詩論》與先秦學術思想史的重構」(14FZX005)。原為「先秦儒家心性之學的歷史軌跡：從簡帛文獻到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」的第一部分，初稿約七萬字，修訂後有九萬餘字，曾提交以下學術研討會，並在會上部分宣讀：中國古代散文學會、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主辦「中國古代散文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古代散文學會第十年會」(北京，2014年10月12日至15日)；北京大學中文系主辦「北大—臺大「中國古典文學與文獻學術研討會」」(北京，2014年11月21日至22日)；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、臺灣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「第十一—先秦兩漢學術國際研討會」(北京，2014年12月13日至14日)。

毫無疑問，關於先秦儒家心性學說，中外學者業已取得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，但是在用新出簡帛文獻考察其理念體系和歷史軌跡方面，可以開掘的空間依然很大。若論已有成果，那麼基於《五行》考察儒家心性學說的著論較多，將視野推進至郭店楚墓所出其他儒典的則較為鮮見，能進一步聯繫上海博物館所藏《詩論》等儒典的就更加稀少了，然而它們跟《五行》一樣，都是儒家心性學說的重要發源地。

實際上，《詩論》是一個具有多方面特質的文本，我們可以把它放到純粹詩學尤其是《詩經》學的歷史脈絡中觀照，也可以把它放到儒家心性學說的發展路徑上審視。¹而無論在哪一方面，它都有不可忽視的重大意義。本文將圍繞其核心範疇展開論析。

一、管

《論語·公冶長》篇記子貢曰：「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；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²事實上，孔子言「天」或「天命」，在《論語》中還是可以找到一批材料的，其言「性」者，從《論語》中確實難覓蹤跡，殆僅有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」一條。³

1 在文本構成中起引導作用的「孔子曰」得到確認，「卜子曰」、「子上曰」諸釋文被排除以後，參見李零：《參加「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」的幾點感想》，《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》（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130-132。並參見馬承源：《〈詩論〉講授者為孔子之說不可移》，《馬承源文博論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361-366；濮茅左：《關於上海戰國竹簡中「孔子」的認定：論〈孔子詩論〉中合文是「孔子」而非「卜子」、「子上」》，《中華文史論叢》2001年總第67輯，頁1-10，頁11-35。美國學者夏含夷（Edward L. Shaughnessy）清楚地回顧了這一爭議的解決過程，可以參見氏著：《重寫中國古代文獻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20-21。上博《詩論》的基本學術性質已經十分清楚了。首先，該文本現存有六處「孔子曰」（此外殆有若干處遺失），差不多引導著它的全部文字。其次，該文本之內容是從各個層面上研討《詩經》，比如論詩的本質以及風、雅、頌的區隔，評析一系列具體詩篇或其中具體章節、語句等。這兩點決定了《詩論》雖出於孔子後學之手，可它所載錄的內容卻主要是孔子本人的《詩經》學建構，其對認知孔子學說的價值約略與《論語》相類，惟側重於孔子以《詩》教的材料而已。而從思想學術史方面說，在比較完整地把握了孔子後學的心性學說以後，再回望《詩論》，亦可確知其觀念體系當早於孔子後學。

2 朱熹：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），頁79。

3 同上注，頁175。